

纸鸢竹马看儿嬉

——宋代婴戏图里的儿童体育

●李响 郭玉成

婴戏图是古代绘画的经典题材,形象地记录了古代儿童体育活动。通过婴戏图与文字史料互证,我们可以领略古代儿童体育的艺术旨趣、文化韵味和历史内涵。

唐代及以前,儿童往往是仕女图等绘画作品中的辅助角色。在宋代,形成了以儿童为绘画主体的独立画科——婴戏图。宋代著名画师苏汉臣就因精通婴戏图绘画而被赞誉“尤善婴儿”。元代婴戏图现存较稀少。明清时期的婴戏图出现了相对夸张的绘画风格,创新内容相对较少,大多为追求吉祥富贵的图样。相比较而言,宋代的婴戏图更具有写实性、创新性、叙事性特点,能够较为直观、准确地表现宋代儿童体育活动的特征。

古人往往把多子多福的理念融入婴戏图中,从而形成了婴戏图独特的绘画风格。宋代画师常在婴戏图中绘有儿童体育活动等休闲娱乐场景。绘画中儿童众多,活泼可爱、身体茁壮,蕴含了人丁兴旺等美好寓意。

宋人非常注重休闲娱乐,这为儿童体育活动进入绘画作品中创造了前提条件。宋人将节日里儿童参与体育活动的欢庆场景入画,也反映了他们对儿童参加体育活动的关注。

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《百子嬉春图》描绘了众多宋代儿童体育项目,图中左上角的放风筝,展现了“才乘一线凭风去,便有愚儿仰面看”的生动景象,左下角几个孩童举着一张“狮子皮”,后面两个参与舞狮活动的儿童被一旁进行的蹴鞠活动所吸引。这幅婴戏图细腻描绘了节令性的儿童体育活动,生动展现了在特定节令里,孩子们沉浸在体育活动的欢乐氛围中。他们愉悦的动作与节日的氛围交织成一幅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画面。

宋代婴戏图体现了宋代体育的休闲性与创新性。《长春



宋苏汉臣《童戏图页》跳绳(局部)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作者供图

百子图》中的蹴鞠活动便是宋代蹴鞠改良后的玩法,娱乐性更为凸显,竞争性则大大削弱。《百子欢歌图卷》中的竹马装饰得精巧雅致,为了呼应骑竹马活动,孩子的头上与手上还设计了“穿搭”,改变了以往简单的“嫩竹乘为马,新蒲折作鞭”的运动形式。除此之外,《童戏图页》中的跳绳活动、《蕉

荫击球图》中的捶丸活动,以及《长春百子图》中的相扑活动等,都展现了轻松诙谐的休闲运动形式。

中国的闲适文化至宋代全面兴起,使这一时期的体育活动呈现出“重休闲并趋向娱乐”的特征,体育活动的对抗性削弱,观赏性逐渐增强。通过宋代婴戏图我们不难发现,图中儿童体育活动趣味性浓厚。《长春百子图》中所绘的蹴鞠就将球门去掉,以展示个人技艺为主。

宋人也意识到体育活动对儿童健康的重要性。我国现存最早的儿童医疗专著是宋代钱乙的《小儿药证直诀》,其中认为,富贵家庭的儿童大多吃得精致且油腻,易导致脾胃阻滞;穿着大多华丽精美,但较少参与锻炼,难以抵御风寒。因此主张儿童饮食不宜过频过饱,穿着应轻便些。宋代《续博物志》中说:“今之纸鸢,引线而上,令儿张口望视,以泄内热。”可见宋人已经意识到体育活动对儿童的保健作用。

受理学思想与童蒙教育的影响,宋人十分重视儿童教育,并发现了体育活动特有的教育属性。他们将知识传授融入体育活动。宋代文献记载了体育活动对人的道德品格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。宋代《蹴鞠谱》《棋经十三篇》均对运动项目的技术与道德品格等提出相应要求,体现了体育活动的教育价值。

宋代婴戏图多与民俗文化紧密结合。寒食节的放风筝、元宵节的跳绳等节令习俗,常被赋予祈福纳吉、辟邪除秽等寓意。

婴戏图凭借独特的艺术魅力与文化内涵深受人们喜爱。将儿童体育与绘画相结合是婴戏图特有的艺术表现形式。加强对体育题材婴戏图的研究,还可以为体育学与艺术学、图像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提供助益。

玉声贵清越

●孙利娟

在世界各大文明中,少有如中华文明这么重视玉器,赋予玉以独特的文化内涵。《礼记》说:“君子无故,玉不去身”,因为玉象征君子之德,君子之所以为君子,正因其德行高尚,若是将比德之物去掉,君子就没有立足之地了。

《管子》说:“夫玉之所贵者,九德出焉。”玉有九种美好的品德,“温润以泽,仁也;邻以理者,知也;坚而不蹇,义也;廉而不刿,行也;鲜而不垢,洁也;折而不挠,勇也;瑕适皆见,精也;茂华光泽,并通而不相陵,容也;叩之,其音清搏彻远,纯而不杀,辞也。”除了有玉有九德的说法外,还有玉有五德的说法。《说文解字》则说“玉,石之美者,有五德”,分别是“仁、义、智、勇、洁”。不论是“九德”还是“五德”,玉因德而美。历史上有不少与美玉有关的故事,读来令人深思。

春秋时代有一位叫子罕的贤者,子罕在宋国位列六卿,任职司城,即主管建筑营造等事务。子罕有“施而不德”的美德,即施舍他人却不标榜自己的德行。有一年,宋国发生饥荒,子罕向宋平公请求拿出公室的粮食借

给饥民,获得同意,子罕又拿出自家余粮,并且不要求借粮的人写借据,等于是将粮食赠给了饥民。

子罕的美德还体现在“不食为宝”。有人向子罕进献美玉,遭到子罕的拒绝。他对献玉人说:“你以美玉为宝,我以不食为宝,我收下你的美玉后,我们各丧其宝,不如我们各留其宝。”献玉人担心因玉招祸,出于对子罕的信任,请求他的帮助。子罕请人对玉进行加工,提高其价值,将玉卖了后,让献玉人持钱回家。在这件事上,子罕始终保持了清白操守,护住了内心的廉洁之宝。

在一场风云变幻、天下争霸的斗争中,美玉也扮演了颇为重要的角色。鸿门宴上,范增再三举起他的玉玦暗示项羽,要以绝后患,项羽犹豫不决。等刘邦不辞而别后,项羽又收下了刘邦托人敬送的一双白璧,放在座位一旁,而范增面对刘邦托人相赠的一双玉斗,随即拔剑击碎,长叹一声,他已看清历史的走向:“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。吾属今为之虏矣!”

“宜将剩勇追穷寇,不可沽名学霸王”,沽

名钓誉,却失去事业成功的大好时机,这是我们从鸿门宴故事中学到的教训。

写出鸿门宴波澜起伏情节的司马迁,据说也有一段与美玉相关的故事。司马迁任太史令时,将军李广利千方百计想拉拢他,于是派人给他送来一对珍贵的玉璧。

司马迁认为,玉璧贵在无瑕,人也应该这样,若我收下这对玉璧,心灵上就会留下污点,并且还将受制于人,未来写史的时候难免受到影响,从而影响史书的公正性。他修书一封表明自己的心志,连同玉璧一起送回。司马迁作为史官,深知秉笔直书,善恶必记的史官传统,而要传承这一传统,就得抵挡得住诱惑,他用自己的言行做到了这一点。班固在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中,称赞《史记》“其文直,其事核,不虚美,不隐恶,故谓之实录”。《史记》是一笔财富,司马迁退还玉璧,传承史官优良传统,这也是一笔宝贵财富。

《诗经·卫风》有诗云:“有匪君子,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。”美玉的本质是石头,只有经过仔细地切磋琢磨,才能温润、清澈与华美,而每个人的修身养性,又何尝不是如此?

中国传统文人的壮游

●吴筱燕

对中国文人来说,游历是一种重要的修行。它关乎四海八荒的地理空间,关乎存放庶民悲欢的社会空间,关乎安放自我,更关乎积极进取

公元766年,杜甫来到气象万千的山城夔州。这一时期,杜甫的创作技艺臻于完美,写出了长诗《壮游》。

在诗中,杜甫忆起年轻时自己曾乘船到江南,游历美丽山水,追慕历史传说……这次长达三四年的漫游后,杜甫前往洛阳参加进士考试,但没有被录取。于是,他开始了第二次漫游,这次的目的地是齐赵,也就是今天的山东与河北南部。在那里,杜甫呼朋引伴、纵歌游猎,并登临泰山,写出了著名的《望岳》。

“壮游”一词,借助杜甫的诗歌深深地印在了中国文学史上。1000多年后,当20世纪的译者面对“Grandtour”(欧洲贵族子弟的大旅行)时,很自然地就找到了对应的中文“壮游”。

历史学家的壮游

司马迁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中写道:“二十而南游江淮,上会稽,探禹穴,窥九疑,浮于沅湘;北涉汶泗,讲业齐鲁之都,观孔子之遗风,乡射邹峰;厄困薛彭城,过梁楚而归。”由于家学渊源,司马迁已经学习了大量历史知识。每一个他踏足的地方,都埋藏着历史讯息,等待他去印证、去发现。

如在淮阴,当地人告诉司马迁:韩信布衣时虽然穷,却已经有了雄心壮志。他的母亲去世后

连埋葬的钱都没有,韩信就到处寻找平坦、地势高、旁边可居万户人家的地方。司马迁特地去了韩信母亲的坟墓,确如传说一般。这些当地流传的故事被写入《淮阴侯列传》,生动烘托了韩信由草根而起的形象。

在《孟尝君列传》中,司马迁写道:我曾到过薛地,那里的民间风气与邹地、鲁地迥异。当地人解释,因为孟尝君招来了天下的侠客等,据说有6万多家。司马迁感叹:“世人说孟尝君好客自喜,名不虚矣!”

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。司马迁到鲁地参观孔子的庙堂、车服、礼器;顺湘江而下,凭吊在汨罗江投水的屈原、先驱的贾谊……在旅行中,司马迁就像一个精力充沛的探险者、充满好奇的新闻记者,印证自己所学的历史知识,也进一步开阔了自己的历史视野。这些山河往事、风尘传说和各种典籍一一进入他的笔下,铸就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通史。

山水与宦游

西晋末年,动荡迭起。面对整体性的社会危

机,不少文人士大夫躲入老庄思想,热衷在诗文中谈论玄虚的哲理。老庄思想崇尚自然,而山水林野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,因此走入山水势所必然。

不过,西晋文士多半居于洛阳,北方平原缺少会稽、永嘉二般的美丽风景,所以这种风气还不是那么明显。永嘉之乱后,玄言、哲思在江南找到了完美的载体,玄言诗逐渐转变为山水诗。

其中,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谢灵运。谢灵运任永嘉太守时,经常离开官署寻山涉水,一去就是十天半个月。他尤其喜欢去那些幽静、险峻的地方,每到一地就作诗歌咏,以致其意。

隋唐大一统后,人们的活动范围大为增加。唐代的陆路交通以连通长安、洛阳的两京大道为枢纽,汴州、凤翔为枢纽两端的延伸点,向四方辐射,形成巨大的交通网络,东北经太原、幽州达于渤海,西北由凉州、西州通葱岭,向南经兴元、成都,过石门、青溪二道,可通南诏、安南,水路则经由大运河将黄河、淮河、长江几大水系打通。这种辽阔的空间意识,是此前文人很少具备的。

不过,唐代文人的游历主要属于宦游,即赴京参加科举考试、干谒,到各地求取、为官以及奉

使、迁贬等。于是,很多美丽的诗歌都以地名为题,甚至常常是作者写于旅行之际。可以说,如果没有塞外,没有江南,没有夔州,也就没有唐诗。

“游必有方”

明代中后期,江南经济日益富庶。此时的旅行,不再只是短暂的青春冒险,或劳顿的宦游行旅,而有了享乐、休闲的意味。

1587年,徐霞客生于江阴一个日益没落的望族。父亲为其取名“弘祖”,期待他能重振祖业,但徐霞客童子试落第后就决意放弃功名。他喜欢读书,尤其是地理、历史、方志、游记、探险类书籍,也喜欢出门探险。

17岁时,徐父去世,家中只剩母亲操持家业。徐霞客很想出门游历,但念及“父母在,不远游”而有所迟疑。这时,他的母亲接上了下一句话:“游必有方。”徐霞客的母亲王孀人是一位坚强、精力充沛的女性。她鼓励徐霞客要做那“屋外松”,勿学“盆中景”。不仅如此,她还同儿子一起出门远游,这在当时成为美谈。

发掘非遗特色化、传统化、民间化、个性化的美学价值,唤醒非遗生动质朴、精工细作、顺天应时、承星履草的文化精神,汇千泉万瀑、生千变万化,让非遗绽放更加迷人的光彩

■ 我看我说

非遗保护,以活态激发活力

●张铁

生活中,处处可见非遗。或秦腔高亢、或南音悠扬,入夜时分,不同城市总有自己的声音密码;窗花对联压岁钱,粽子月饼和汤圆,逢年过节,这是大江南北统一的仪式感;而那些水墨、剪纸的动漫作品,那些襦裙、深衣的华服国风,更是受到年轻人青睐……传统与现代融合,文化与情感交织,非遗就这样在现代生活中焕发新的光彩。

长于大地、顺于时令,源于劳作、寓于生活,人们的世代相传,形成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“非物质”的属性,决定了非遗不能仅仅被宣之于展板、陈列于展架,而是更需要活态的保护、传承与发展。非遗的独特性在于,它是内嵌于社会语境和日用常行之中;而非遗最根本的价值,正在于深蕴其中的审美趣味、精神内涵和文化记忆。

活态保护,一个重要的出发点,就是从非遗所处的社会文化系统出发,更好地涵养滋生其上、浸润其中的一方水土。比如,陕北秧歌,本就是高天之下厚土之上“茂腾腾”的抒情,是房前屋后茶余饭后“活生生”的日子。无论是美术、曲艺等艺术形式,玉雕、刺绣等精工绝艺,还是礼仪、节庆等民俗活动,作为一种文化表达,非遗保护的背后应该是文化生态的保护,如此才能让非遗在活的土壤中得以绵绵不绝、生生不息。

让人欣慰的是,有着秧歌、腰鼓、石雕等非遗的陕西榆林,已经被确定为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区。截至2023年8月,这样的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已经有16个。闽南文化、徽州文化、客家文化、铜鼓文化……这些文化生态保护区让非遗与街区、社区、村镇有机融合,让非遗与生产生活、自然环境、经济形态、人文精神共生共存,“见物见人见生活”。可以说,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,正是做好非遗整体性、系统性保护的题中应有之义。

当然,时代总在前进,变化必然发生。当高铁让千里咫尺,当网络让无远弗届,不少如活字印刷、珠算、川江号子这样的非遗项目,难免会渐渐远离日常生活的上下文。但换个角度看,无论是社会的流动、信息的流通还是技术的流变,都让非遗进入了一个更大的世界。喇叭不仅能吹出《百鸟朝凤》,同样可以吹出摇滚的曲调;剪纸不仅能剪出窗花,同样可以剪出时装的纹样;而视频平台上,非遗的展示更是推陈出新、蔚为大观。作为一种“文化遗产”,非遗可以也应该成为一种公共文化资源,在保持自身特点的同时,嵌入更为宏大的文化结构之中。

所以,另一种活态保护,是通过传统与现代的链接,将非遗再次激活。无论是把非遗引入不同的艺术形式,还是将非遗打造成网红商品,或者是依托非遗策划旅游项目,非遗完全可以凭借独特的魅力打开新的空间,重新进入火热的生活场景。其中关键就在于,发掘非遗特色化、传统化、民间化、个性化的美学价值,唤醒非遗生动质朴、精工细作、顺天应时、承星履草的文化精神,汇千泉万瀑、生千变万化,让非遗绽放更加迷人的光彩。

有学者说,中华文明离不开“三棵树”——桑树、茶树、漆树,正对应着传承千年的丝织技艺、茶文化和漆器漆艺这三大类非遗,注解着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。当我们让闪耀于岁月深处的非遗成为现代生活的新滋养,一定能在对技艺之美、匠心之美、精神之美的重新发现中,涵养出更加深沉的文化自信。

在此之前,中国文人主业为官,旅行只是兴趣。徐霞客却将一生精力都用来游历,可谓职业旅行家。30多年间,他几乎年年出门,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。当时的名士陈继儒以其常年风餐露宿、行走在云霞之间,为其取了个别号“霞客”。

徐霞客很有探险精神,越是人迹罕至的地方越要去。他不仅是在探险,也是在实地考察。举个例子,先秦地理著作《禹贡》认为长江的源头是岷江,后世一直沿用这一说法。徐霞客经过多地考察认为,金沙江是长江的源头。在科技手段匮乏且独立作业的条件下,徐霞客的这一发现是地理学上的重大创举。

更为重要的是,徐霞客每天旅行回来都要记日记,有时甚至站在山路上、背靠悬崖即时记录。据统计,他记载了地貌类型61种、水体类型24种、动植物170多种、名山1259座、岩洞溶洞540多个。

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,徐霞客仍在游历,最后在云南时已然无法行走,当地官员不得不派人将其抬回老家。病榻之上,徐霞客对朋友说:“张骞凿空,未睹昆仑;唐玄奘、元耶律楚材随人主之命,乃得西游。吾以老布衣,孤筇双屐,穷河沙,上昆仑,历西域,题名绝国,与三人而为四,死不恨矣。”张骞、玄奘、耶律楚材都是奉君主之命出行,徐霞客却以一个布衣之身走遍各地,可谓死而无憾。

对中国文人来说,游历是一种重要的修行、一个重要的传统。它关乎四海八荒的地理空间,关乎存放庶民悲欢的社会空间,关乎安放自我的老庄哲学,更关乎积极向外的进取精神。在一次次壮游中,人们可以增长见识、开阔眼界,实现自我教育、自我成长。